

热心办学 德耀桑梓

——高家驹办学两事

陈克华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中国人民遭受日军侵略，大片国土被敌人占领。1941年4月22日、23日，慈溪、余姚两县县城相继沦陷。中学和大部分小学停办，适龄儿童饱受失学之苦。但当时在现境道林镇择浦乡（原属余姚县道林区，1954年慈溪、余姚、镇海三县县境调整，划归慈溪县），有一位高家驹先生，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在1942年，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群策群力，创办择浦乡私立新塘小学，至1949年解放，在1942年暑假，发动、倡议，成立“游山区战时教育促进委员会”，使全区18个乡的中心小学相继复学，失学儿童重新获得读书的机会，为道林和游山区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高家驹（1901-1989年）今慈溪市道林镇择浦乡新园村（横新塘自然村）人。父高耀（1865-1917年）名福荣，字屏南，清廪贡生，曾任乡贤吴锦堂创办的锦堂学堂预科国文教师，包容、陈之伟、童玉民等均为其得意门生。后在白沙、道林等地设馆授徒；兼擅医理，为人治病、疗效显著，深得群众赞誉。生有三子，长子肖龙，字云才，英年早逝；次子驹，字武龙。

高家驹出生于书香之家，幼承庭训，稍长，随父就读锦堂两所小学受启蒙教育。天资聪颖，成绩优良，加上受家父亲炙，有扎实的国文功底。当时该校已拥有较完备的西洋乐器，供学生课余吹打。高家驹有音乐天赋，不久即成为吹奏军号、喇叭、笛子，打击铜鼓的能手。他有一诗怀念这段学校生活：“歌吹奏晨声朗朗，乐鼓蓬蓬气势雄。水思源怀母校，声声歌颂播兰芳。”1919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实用化学科肄业，1927年毕业于南通大学农科农化系。早年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任助教、讲师时，结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和田汉、沈雁冰、夏衍等人有交往，倾向革命。抗战前，历任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改良总场、江苏省建设厅、浙江省农业区改组技术科，温州办事处主任。1942年春，在温州茶区茶叶检验处主任任上，回家探亲，因驻地主任任上，交通断绝，遂滞留于家乡，以耕种田地维持生计。

当时游山区、道林区一带，所有学校已全部关门，连久负盛名的道林镇达三小学也不例外。高家驹先生见此现状十分痛心，深感教育救国，义不容辞。经深思熟虑，在横新塘、长埭屋、路东三个自然村中推举开明人士周佩芳、高桐芳、高介芬、高怡龙、周锦荣、周玉泉等人，共商办学大计。他陈述战时办学的重要

性，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经他激情慷慨的陈词，与会者倍受感动与启发，决心首先在择浦乡创办一所完全小学。通过分头宣传教育和发动，上述人员多次与高氏宗祠永思堂（享堂）的各房族长和宗祠地管人反复动员、协商，最后征得高氏族人同意和群众赞成，商定高氏享堂的房族作为校舍（享堂内原设有私塾，塾师为高桐芬），祠产近百亩土地的地租作为学校基金。呈请乡政府批准，区、县政府备案。乡政府定名为择浦乡新塘代用中心小学，同意拨少量资金作开办费，将乡里没收的南北二院堂的30余亩土地的租金收入给学校。嗣后，成立校务委员会，推举高家驹为主任委员，周佩芳、高桐芬为副主任委员，高介芬、高怡龙、周锦荣、周玉泉为委员。上述人员均是村庄上的知名人士，家境殷实，热心教育，为家乡尽义务，不取分文报酬。且能齐心协力，克尽职守，善始善终。

高家驹重视师资的挑选，为聘请德才兼备的老师到穷乡僻壤任教真是绞尽脑汁。礼贤下士，登门拜访，先后延聘高甘霖（蔚农）、高立安、龚占鹤、岑蔚然等为校长，周群平（容湖）、陈亦平（祥康）等为教师，都是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都有真才实学，聘请的体育、音乐、美术老师也都学有所长。开学前，敦请、规劝享堂附近的农户，搬掉原先存放在享堂内的稻桶、水车等大型农具和寿（棺）材，清理堆放在天井、晒场的柴草、肥料等杂物。办六年制完全小学教室不够，有几个班采用“复式班”教学（即同一教室内有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老师先后分别给两班学生讲课，布置作业，交替进行完成教学任务）。高家驹以“国家大本在教育，民族至宝是儿童”为办学宗旨，作为楹联张贴于礼堂立柱。办公室门口贴“树屋容易树人难，心血点滴皆开花”勉励立德育人。校园四周种植树木不但美化环境，更让师生知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古训。提出“期望师生认清时代新潮流，愿望各方人士维护苦学校”，告诫师生国难当头，读书不易，要发愤图强、勤勤恳恳，做国家有用之人。自己苦学，做国家有用之人。你看，新塘多么地广！你看，新塘多么地广！这是大道，这是康庄。我们要在两旁桃李栽培。春风时雨年年花养，红白花几千万万正开放。看谁最挺秀！最劲强！”这是高家驹发自内心的召唤，也是对莘莘学子殷切的期望。他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免除贫困学生的学杂费，甚至赠送课本。

1942年春，乡代用中心小学隆重开学。当时已没有课本可买，教师自己选编教材，刻印装订成册作为讲义。教师

在课堂上注重爱国主义和抗日救亡教育。如教一年级新生“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中国人爱中国，大家都来爱中国。”高年级选岳飞的《满江红》，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正气歌》、林觉民的《与妻书》、（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等。大力提倡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周末组织朗诵爱国诗文，演出抗日救亡活报剧，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抗日救亡意识。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操场面积小，因陋就简，安装单个篮球架。请木匠制作“木球”代替足球。自制铁环、跳绳、毽子。挖沙坑，便于跳高、跳远。购置风琴等乐器。凡乡级中心小学应有的劳美音体的教具体材，这所学校基本齐备。经常举行拔河和拔河比赛，组织学生野外写生，校园文体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充实上述人员均是村庄上的知名人士，家境殷实，热心教育，为家乡尽义务，不取分文报酬。且能齐心协力，克尽职守，善始善终。

到第二年，生源除择浦、道林外，远至新浦、胜山、三管、樟树、横河、彭桥等地的家长托亲挽友，慕名而来。仅一次扩招了20余名外地学生（大多寄宿在学校附近亲友家）。几年后，小学生毕业，没有初中可读，学校顺应民意，开办初中补习班。高家驹亲自教授英语、化学（仅收少讲讲课费），高甘霖任物理、数学主任文史课程。这个补习班虽然只办一个学期，却具有初级中学的雏形。当时姚北没有中学，填补了游山区学校停办的空白，在道林、游山及姚北地区的教育史上可以说是首创。

高家驹开源节流，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坚持勤俭办学。开学之初，乡长韩文华仅拨给少量资金，但原先的承诺，以后未能兑现。而祠产租尚未征收，致使教师薪水和吃饭都成问题。师生到乡政府请愿，要求发给资金未果。学校被迫自力更生，易名为择浦乡私立新塘小学。高家驹率先带头叫妻子做好可口饭菜，免费一日三餐送到学校，为期一周。并要求各校务委知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古训。提出“期望师生认清时代新潮流，愿望各方人士维护苦学校”，告诫师生国难当头，读书不易，要发愤图强、勤勤恳恳，做国家有用之人。自己苦学，做国家有用之人。你看，新塘多么地广！你看，新塘多么地广！这是大道，这是康庄。我们要在两旁桃李栽培。春风时雨年年花养，红白花几千万万正开放。看谁最挺秀！最劲强！”这是高家驹发自内心的召唤，也是对莘莘学子殷切的期望。他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免除贫困学生的学杂费，甚至赠送课本。

1942年春，乡代用中心小学隆重开学。当时已没有课本可买，教师自己选编教材，刻印装订成册作为讲义。教师



高家驹（1901-1989年）

敢于与触犯道德、法律底线的一些人进行较量，甘愿得罪人而不悔。办学前，每逢清明、中秋、年关，高氏族人按丁均能分到年糕、烧饼（香饼）、咸鱼、咸肉等物品。祠产改作校产后，没有实物分配，气量狭小的人，对这点小福利耿耿于怀，认为高家驹是“罪魁祸首”。享堂附近的农户搬掉存放在享堂的农具杂物，禁止在天井、操场晒麦、稻谷及棉花等，这些农户为一己私利，心存怨恨；经常有人偷挖小便宜，偷捕公家养殖的鱼类；不顾公序良俗夜间到学校灶间偷吃剩饭菜，偷窃大米，经人赃俱获，不知羞耻；女教师寄信在校，夜间有人敲门窗，妄图调戏、猥亵，甚至图谋不轨……凡此种种，高家驹均要过问、处理。他除晓以大义外，为做效尤，一心为公，事事认真，不徇私情。这些无赖之徒，不思悔改，反而怨恨在心。1945年10月，三五支队北撤后，地头蛇认为高家驹已无“靠山”，想收回择浦南北两所院堂三十余亩院产的租（地租）金，向余姚县法院状告家驹“霸占院堂产业”，经查无实据而败诉。当事人犹不甘而变本加厉，又向浙江高等法院宁波第三分庭控告高家驹“依仗三五支队邪恶势力，肆意霸占大量公堂产业，为共匪兴办祸国殃民之赤化学校”。“通共”是大罪，羁押十天，不得保释。后费尽许多周折，经查无实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家驹才无罪释放。为应诉奔波于宁波、余姚，心力交瘁，元气大伤。有人丧尽天良，故意在他家水稻田里撒稗草种子，影响水稻生长。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中，对家驹私仇公报，施尽攻击、诬陷之能事，诬陷他为“恶霸”及“公堂地主”，抄家、揪斗、侮辱，使他身心受到莫大摧残。

办学不到一学期，私立新塘小学因名师不到，校风正，学风严，教学质量高而遐迩闻名。学校声誉日隆，高家驹内心当然欣慰，但想到国难当头，周边无数的学龄儿童无学可上，岂能坐视不管？夙兴夜寐思虑全区各乡镇中心小学复学。他有了这个雄心壮志，凭借创办小学良好的社会舆论，于是萌生了使游山全区的中心小学复学的想法。在高家驹的奔走倡议和推动下，因势利

导，几次邀集游山区社会贤达胡圣阶（横河）、胡志明（乌山）、杨明川（白沙）等人共商全区小学复学大计，倡议成立“游山区战时教育促进委员会”。达成共识后，再分别召集各乡中心小学校长磋商复学事宜，得到各乡乡绅和校长的拥护和支持。高家驹又到当时从浦东南渡杭州湾登陆后，已取得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番号的浦东部队第一支队队长顾小汀的驻地去沟通，得到顾的支持并承诺协助筹办开学经费。遂于1942年暑假，18个乡（全区19个乡，当时崇寿乡因相公殿打响抗日第一枪已被日寇严控）的代表在新塘小学开会，成立“游山区战时教育促进委员会”。一致推举高家驹为主任委员，杨明川、胡志明为副主任委员。从此，18个乡的乡中心小学相继复学，失学儿童重新获得读书的机会。这一举措，对游山区的教育事业是有历史意义和影响的。可惜这一史实未能载入慈溪、余姚两地的《教育志》。

高家驹倾向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三五支队的地下武装斗争。1943年12月29日，三北自卫总队队长王仲良（耀中）和海防大队一中攻打樟树庙伪中队据点，经激烈战斗，打击了伪中队嚣张气焰（事载《中国共产党慈溪历史大事记》72页）。有位战士在战斗中上臂受伤，撤退时孤身来到横新塘村时和部队失去联系。同村村民高云龙告知高家驹，家驹听到这一消息后，冒着“通共支队”一罪名的风险，留住这位伤员清创、止血、包扎（家里备有医药用品），在家里秘密养伤。伤愈后，派高坤龙、高云龙把这战士和一支步枪护送到三五支队妙山（今堰堰镇昌隆村）的驻地。他鼓励嫡堂弟高胡龙参加三五支队，为他改名中坚，王仲良给他一个编外“勤奸小组”，任组长，高中坚以后成为解放军的干部。1944年3月，中共建立游山区署，区长为朱人侠。在成立大会上，高家驹应邀作了“团结抗日，除恶务尽”的演说，赢得三五支队领导的好评。

高家驹由于办学和社会上的言行，在当地有良好的口碑。当时与三五支队领导干部，如三北特派员王仲良、中共余姚县长谢仁安等有过交往，王、谢等领导对他时有好评，认为他是一位共产党信得过、靠得住的统战对象，曾邀请他参加三五支队，去浙东区委宣传部任（副部长黄源）任职。高家驹因致力于家乡小学教育没有应召。否则，他的后半生可能改写。

高家驹有正义感，疾恶如仇。他在贸易委员会温州桐油储运处任主任兼技师时，查出奸商在出口桐油中混水，奸商以钱物向他行贿，想蒙混过关出口以牟取暴利。他断然拒绝，并勒令这批桐油退货，迫使奸商登报道歉，高家驹受到上级嘉奖。

抗战期间，岑永远、岑永春两兄弟先后任择浦乡伪乡长。二人均吸食鸦片，贪污、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群众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高家驹发动群众，组织清算委员会先后和两人清算贪腐账目。结果真相大白，声名狼藉，被迫先后下台。此举大快人心，深得群众称赞和拥护。土匪头子陈金木以白沙河角（今白沙街道）为据点，在游山、横河、道林、坎墩一带，抢劫烧杀，无恶不作，连几岁的孩子一听到杀人魔王——“陈金木来了！”一句话，会立即停止哭闹的。高家驹一介书生，胆识过人，敢将虎须，不顾身家性命，决心为民除害。呈告余姚县长詹世骧，并通过浙江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因属阮毅成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系主任时第一期毕业生，又在浙江省民政厅视察署任过职，与阮有师生谊也是下属）要县长缉捕严办。他具有非凡勇气和魄力，敢于亲自引颈缉捕官兵到陈家捉拿。由于阮匪受侦缉队长赵相英的庇护，几次缉捕行动泄密，陈金木得以事先躲避。当他获悉高家驹所为，扬言报复，要灭门灭害。有一次阮匪已闯入高家驹家门，幸妻儿早已躲避，免遭一难。他母亲受惊吓得病，两个儿子弃学离家避难，全家不得安宁。不久又潜回白沙，1949年6月6日，被新四军原北撤部队战士胡光元在姚北剿匪时，将阮匪击毙于稻田中，高家驹才无后顾之忧。

他还抵制伪乡政府以“壮丁训练”为名，向村民敲诈勒索，在横新塘村组织三村联防大队，请高胡龙组织壮丁训练，加强夜间巡逻，成立勤奸小组，保一方平安。在村内严禁赌博，大义处理参赌的堂弟，煞住赌风，传为佳话。

道林、择浦是钟灵毓秀之地，新塘小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1942年至1949年八年间，从新塘小学走出去的师生人才济济。首任校长高甘霖，20世纪50年代就成为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术教师陈亦平，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美术创作，版画家，入京画报编辑部《慈溪书画家》。周君平老师，部队军官转业后任安徽省文史办主任。受过老师启蒙教育、受熏陶的学生或参军或深造，有的成为教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科院研究员、省级医院主任医师、报社记者、高级教师、干部等国家有用人才。许多校友回乡探亲或同乡、同学相聚，每提起母校、老师、同学时，对高家驹先生均表深情缅怀和无限尊敬。赞扬他义务办学，克尽职守，功不可没。

还要补叙高家驹先生的身世。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工作岗位，历任浙江省农业改进所视察员，浙江省有机肥料厂筹备主任，江苏省立江阴农校教师。但他关心私立新塘小学而不改初衷、矢志不渝，一如既往，仍任校长、主任委员。经常与同乡、校友、教师保持联系。星期日返校，主持重大校务工作，不取分文报酬，直至解放，由人民政府接管。解放前夕，短期在余姚师范、余姚一中任教。1950年，应宁波农专专员朱之光之邀，在

宁波地区棉农代表大会上作棉花增产的专题报告，得到与会代表和上级好评。讲稿发表于同年1月14日的《甬江日报》。1950至1958年，先后在杭州、金华农校任教。1957年当选为金华市政协委员。在鸣放会上对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提过意见，被划为“右派”，降职降薪，在农场和农村监督劳动。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原籍务农。漫长的22年，失去工作，与妻子相依为命。为生活，忍痛将三间半旧宅变卖一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此时已风烛残年，多病缠身，但他每年的医药费只去报销几十元。他说，勤俭节约是我一贯的作风，公家的钱也要同样节省。平反后，虽到耄耋之年，仍然壮心不已。为弥补失去的时间，还要重返教坛，为农业教育服务。写诗云：“请复复请复，老夫有雄心。雄心贯日月，参加新征程。”不愿无功受禄，但愿为国效劳。又有诗云：“虚度八旬何足评，无功受禄难为情。老夫仍思报祖国，退休还拟去长征。”想发挥余热之心跃然纸上，但毕竟为时已晚，不能如愿以偿了。他勉励后代要“放大眼光，高张志气，明慧的。必须努力攻读专业，好好学习政治，以期有所深造和成就，为祖国和人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他还有一首《八秩抒怀》诗，概括自己的一生：“驹光飞逝不能留，八秩来临志未酬，雋秀贤良看若宝，奸邪痞棍庶如仇。战时教育苦包抄，恨世虚名恨世仇。曾教包抄悍匪穴，破情打击赌头头。好人拥护小人恨，多数赞扬少数讪（仇）。恶鬼逞凶夜黑黑，钢刀遇火显精透。无端大难半生累，有素忠忱一笔勾。今日党恩施厚，平反昭雪乐悠悠。”可见他的志存高远，胸襟开阔，豁达乐观。他晚年仍手不释卷，听广播、看电视、读外语、作诗词、学针灸、记心得。还为第三代辅导文化课程和绘画而乐此不疲。真是学到老，做到老。

高家驹先生于1989年11月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子二人，长高鸿，大学副教授，画家，入京童影编著的《慈溪书画家》，今年90岁；次高鹏，慈溪市第二医院医生，今年85岁，均健在。第三代遵遗乃祖遗训，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可告慰先生于九泉。综观高家驹先生一生，对家族克绍箕裘，德泽子孙；对社会热心教育，德耀桑梓。坎坷一生，岁月蹉跎，壮心不已，丹心永葆。一代师表，实至名归。

注①：本文承蒙高家驹哲嗣高鸿、高鹏两先生和原新塘小学学生、退休教师董淑娟（凤英）女士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注②：为撰写高家驹先生的事迹，笔者在慈溪、余姚两市档案馆查得下列两则档案，题目附录于后。（a）《慈溪择浦乡横新塘村历史考证》（1985.10）（b）余姚县政府教育科编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第二学期《余姚县教育机关暨学校一览》。

注③：高胡龙事迹载入道林初级中学校本教材《红色故土》。

海地旧事

广袤的三北大地历来是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常年活跃在城镇僻壤各行业的能工巧匠是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原来许多与百姓大众密切相关的老手艺，有的将逐渐失传或已经失传了，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地淡忘消失。传统的手工艺工匠和曾经赖以生存，陪伴走过艰难岁月的旧物件，“老古董”，成了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要说这支工匠队伍，木匠是众多手艺人中的首位。从粗犷简易的车耙农具到精雕细琢的红木桌椅，每一件都集中体现高超的意趣和匠心独运的创造力，凝聚着匠人师傅们的汗水和智慧。在木匠行当中，一般可分有大木作和小木作。大木作主要指建造房屋和翻新，早些年时候建造房屋和翻新，椽子、椽子以及大门窗框都是木头结构的，所以木工在建筑房屋时起到主导地位。所谓小木作主要制作各种的家具，从日常用的桌椅板凳，到婚娶出嫁的大眠床、衣柜、箱橱、箱子、梳妆台等木制品。这些家具都是传统的榫卯组合，榫卯相接，不用一枚铁钉。

一般学木匠需要当满三年学徒，基本掌握要领后才满

房修漏等都离不开泥水师傅。上世纪后期，民间房屋基本上由砖木结构发展为砖头混泥土甚至全部框架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中几乎绝大部分工程由泥水匠来完成。房屋的建造普遍实行包工包料，特别是城乡高层楼宇的崛起，一大批有知识、经验丰富的泥水匠投标成了工程的包头，他们有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数十年前，几乎家家户

都有高超的匠人制作精细的工艺更有美术品。篾匠师傅编织的成品一般在家中门前或杂货店售卖，有时也上门去干活。每年的春粮收割及棉花收获前，是篾匠最忙碌的时候。生产队仓库里许多旧的竹制农具需要修修补补，还要购置一批新的箩筐、畚斗、扁筛、长筛等，用于集体的谷物、麦类、豆类、油菜籽、棉花的摊晒。

上世纪六十年代间，一种新

更有的匠人制作精细的工艺更有美术品。篾匠师傅编织的成品一般在家中门前或杂货店售卖，有时也上门去干活。每年的春粮收割及棉花收获前，是篾匠最忙碌的时候。生产队仓库里许多旧的竹制农具需要修修补补，还要购置一批新的箩筐、畚斗、扁筛、长筛等，用于集体的谷物、麦类、豆类、油菜籽、棉花的摊晒。

上世纪六十年代间，一种新

更有高超的匠人制作精细的工艺更有美术品。篾匠师傅编织的成品一般在家中门前或杂货店售卖，有时也上门去干活。每年的春粮收割及棉花收获前，是篾匠最忙碌的时候。生产队仓库里许多旧的竹制农具需要修修补补，还要购置一批新的箩筐、畚斗、扁筛、长筛等，用于集体的谷物、麦类、豆类、油菜籽、棉花的摊晒。

上世纪六十年代间，一种新

更有高超的匠人制作精细的工艺更有美术品。篾匠师傅编织的成品一般在家中门前或杂货店售卖，有时也上门去干活。每年的春粮收割及棉花收获前，是篾匠最忙碌的时候。生产队仓库里许多旧的竹制农具需要修修补补，还要购置一批新的箩筐、畚斗、扁筛、长筛等，用于集体的谷物、麦类、豆类、油菜籽、棉花的摊晒。

上世纪六十年代间，一种新

工匠的故事

陈百申

广袤的三北大地历来是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常年活跃在城镇僻壤各行业的能工巧匠是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原来许多与百姓大众密切相关的老手艺，有的将逐渐失传或已经失传了，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地淡忘消失。传统的手工艺工匠和曾经赖以生存，陪伴走过艰难岁月的旧物件，“老古董”，成了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要说这支工匠队伍，木匠是众多手艺人中的首位。从粗犷简易的车耙农具到精雕细琢的红木桌椅，每一件都集中体现高超的意趣和匠心独运的创造力，凝聚着匠人师傅们的汗水和智慧。在木匠行当中，一般可分有大木作和小木作。大木作主要指建造房屋和翻新，早些年时候建造房屋和翻新，椽子、椽子以及大门窗框都是木头结构的，所以木工在建筑房屋时起到主导地位。所谓小木作主要制作各种的家具，从日常用的桌椅板凳，到婚娶出嫁的大眠床、衣柜、箱橱、箱子、梳妆台等木制品。这些家具都是传统的榫卯组合，榫卯相接，不用一枚铁钉。

房修漏等都离不开泥水师傅。上世纪后期，民间房屋基本上由砖木结构发展为砖头混泥土甚至全部框架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中几乎绝大部分工程由泥水匠来完成。房屋的建造普遍实行包工包料，特别是城乡高层楼宇的崛起，一大批有知识、经验丰富的泥水匠投标成了工程的包头，他们有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数十年前，几乎家家户

都有高超的匠人制作精细的工艺更有美术品。篾匠师傅编织的成品一般在家中门前或杂货店售卖，有时也上门去干活。每年的春粮收割及棉花收获前，是篾匠最忙碌的时候。生产队仓库里许多旧的竹制农具需要修修补补，还要购置一批新的箩筐、畚斗、扁筛、长筛等，用于集体的谷物、麦类、豆类、油菜籽、棉花的摊晒。

上世纪六十年代间，一种新